

# 论《宋诗选注》推源溯流的文学批评方法

殷满堂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被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学者关于宋诗的最有价值的注本。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审视这一注本,通过对《宋诗选注》的诗人小传和文本注释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其诗人小传还是诗歌笺注,无不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尤其是《诗品》推源溯流的文学批评方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诗选注》是一部现代人写成的《宋诗品》。

**关键词:**宋诗选注;推源溯流;方法

**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6-0117-04

推源溯流法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清代章学诚指出:“《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如云某人之诗,其源出于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其法出于刘向父子。”<sup>[1](P559)]</sup>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推源溯流法源出于刘向父子,而钟嵘则是在诗学批评领域里的最早实践者,之后这种方法在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序跋、论诗诗等文学批评样式中有大量使用。推源溯流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大方法,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特别注重文学史上的传承关系,注重在历史发展中考察作家诗人的创作,通过比较他们与前人创作的异同,从而确立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有深入研究的大师,钱钟书先生深谙此法的妙处,在《宋诗选注》中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批评方法。张伯伟认为,运用推源溯流法评论诗人时,“其完整的评语至少应由三部分构成,即渊源论——追溯诗人的渊源所自;文本论——考察诗人及其作品的特色;比较论——在纵横关系中确立某一诗人的地位”<sup>[2](P155)]</sup>。若以此来考察《宋诗选注》,我们发现《宋诗选注》在文本构成上与《诗品》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一选本由诗人小传和文本注释两部分构成,其中在诗人小传中追溯宋代诗人的渊源所自;文本注释则包含了钱钟书对作品别具慧眼

的解读,即文本论,但不管是诗人小传还是诗歌笺注,始终贯穿着比较的文学批评方法。下面分别从作家论与文本论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

作为一位现代学者,钱钟书先生为什么要采用推源溯流法这种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去研究宋诗呢?这一点与宋代诗歌创作的特点有重要的关系。众所周知,唐诗尤其是盛唐诗达到了中国诗歌艺术的巅峰,宋代诗人想超越唐诗,几乎不大可能,于是选择了摹仿唐人。学习仿效唐代名家、大家诗歌的体貌特征,成为了宋代诗人创作中的普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唐诗是宋代诗人的摹仿对象,也可以说是宋诗之源。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诗人小传中溯源流时,一方面探讨了宋代诗人与唐代诗人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宋代诗人对后代诗人的影响。从钱钟书先生对80位宋代诗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宋诗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宋初、北宋中后期和南宋时期。这三个时期的代表分别为宋初诗人、江西诗派与江湖派。宋诗之源主要有三个:宋初诗人广泛地学习唐诗,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江湖派以晚唐体为源。

先看钱钟书先生论宋初诗人,宋初诗人在学习唐诗上不尽相同:如郑文宝“风格轻盈柔软,还承袭残唐五代的传统”<sup>[3](P3)]</sup>;王禹偁“他提倡杜甫和白居

易的诗,在北宋三位师法白居易的名诗人里——其他两人是苏轼和张耒——他是最早的,也是受影响最深的”<sup>[3](P5)</sup>;林逋“流露出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sup>[3](P10)</sup>;李觏“他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辟的两家”<sup>[3](P31)</sup>;王令“他受韩愈、孟郊、卢仝的影响很深,词句跟李觏的一样创辟,而口气愈加雄壮,仿佛能够昂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大约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sup>[3](P56)</sup>。当然有些诗人的不同诗体受不同诗人影响,如梅尧臣“他对人民疾苦体会很深,用的字句也颇朴素,看来古诗从韩愈、孟郊,还有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sup>[3](P14)</sup>。钱钟书先生不仅推溯了宋初诗人的渊源所自,而且还看到了他们对后代作家的影响。如欧阳修“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萧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替道学家像邵雍、徐积之流开了个端”<sup>[3](P24)</sup>。

钱钟书先生对宋诗的评论,虽没有像钟嵘那样直接“云某人之诗,其源出于某家之类”,但方法是一样的,指出了宋代诗人与唐代诗人的渊源关系。再看他对江西诗派中的几位诗人的批评即是如此。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之说,“一祖”即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钱钟书先生如是评价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他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生前跟苏轼齐名,死后给他的徒子法孙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当然,黄庭坚主张摹仿杜甫,并不是主张一味亦步亦趋地学习杜甫诗歌创作的规范,而是从杜诗中受到启发,主张将古人的成句加以心灵的陶冶,点化而成自己的诗句,即“点铁成金”,实际上含有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再创造的意思。但是,黄庭坚并不是完全按照他的诗学主张来创作的。钱钟书先生认为“黄庭坚有著著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sup>[3](P96~97)</sup>。这也正是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在创作上的最大毛病。这里钱钟

书先生运用这种推源溯流的方法,正确地评价了黄庭坚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至于对江西诗派的其他几个代表人物的评价,他也沿用此法,如评陈师道:“陈师道模仿杜甫句法的痕迹比黄庭坚来得显著。他想到做到‘每下一俗间言语’也‘无字无来处’,可是本钱似乎没有黄庭坚那样雄厚,学问没有他那样杂博,常常见得蹉跎寒窘。他曾经说自己做诗好像‘拆东补西裳作带’,又说:‘拆补新诗拟献酬’,这也许是老实的招供。因此,尽管他瞧不起那些把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的作者,他的作品就很犯这种嫌疑。”<sup>[3](P102)</sup>

钱钟书先生在运用推源溯流法考察江西诗派的几个诗人时,一方面从纵的方向考察了诗人在历史上所受到的传承,另一方面从横的方向比较了同时代诗人的异同高低,由此确立了诗人的历史地位。从这两方面来看,钱钟书先生虽然是对个别诗人的评论,但关注的是整个文学史,因此显示了深邃的历史视野。他评陈与义:“他虽然推重苏轼和黄庭坚,却更佩服陈师道,把对这些近代人的揣摩作为学杜甫的阶梯,同时他跟江西派不很相同,因为他听说过‘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以有意于用事’。我们看他前期的作品,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黄庭坚和陈师道费心用力的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sup>[3](P131)</sup>钱钟书先生的这一分析,既是对陈与义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也在比较中给我们梳理出文学史的发展线索。

至于江湖派,钱先生在徐玑的小传中指出:“他和他的三位同乡好友——字灵晖的徐照,字灵舒的翁卷,号灵秀的赵师秀——并称‘四灵’,开创了所谓‘江湖派’”,“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古典成语、‘资书以为诗’,就要尽量白描、‘捐书以为诗’,‘以不用事为第一格’;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江湖派就抛弃杜甫,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sup>[3](P220)</sup>这表面上是对徐玑的评论,但实际上却勾画出了宋代两大诗派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当然南宋的很多诗人往往在江西诗派和江湖派之间摇摆,如杨万里“据他说,他最初学江西派,后来学王安石的绝句,又转而学晚唐人的绝句,最后‘忽若有悟’,谁也不学,‘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从此作诗非常容易”<sup>[3](P158)</sup>。

钱钟书先生这样的文学批评大家,运用推源溯流法当然不仅仅限于对诗人之间的影响研究,更在于从理论的角度探讨诗歌创作的规律。在诗人小传中,钱钟书先生给我们归纳出了中国诗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博喻的问题、用典的问题、以文为诗的问题、诗与画的问题、理趣与理语的问题、死法与活法的问题等等。钱钟书先生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无不贯穿着史的线索。如在谈到苏轼诗歌善用博喻时,他从《诗经》的国风、小雅,到韩愈的诗歌,再到苏轼、贺铸、谢逸诗歌中的博喻,给我们梳理出中国诗歌史上用博喻的历史。再如他在王安石的小传中,一方面批评王安石:“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而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sup>[3](P41)</sup>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历史上对诗歌用典的态度及状况进行了史的阐述,从六朝时的萧子显不很满意诗歌“缉事比类……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到锺嵘在《诗品》里更反对“补假”“经史”“故实”,到唐代的韩愈“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再到北宋初的西昆体就是主要靠“捃摭”——锺嵘所谓“补假”——来写诗。钱钟书先生溯源穷流,在探讨宋诗时,始终将其与中国诗歌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因此彰显出了强烈的历史意识。

## 二

在《宋诗选注》中,钱钟书先生除了就作家而展开推源溯流外,还特别注重从文本出发,对诗歌中的一些重要的字、句展开溯源。

对诗歌中的一些重要的字、句展开溯源,古人在笺注诗歌时经常运用。这一方法,对于笺注像江西诗派所认为的“无一字无来处”的杜诗尤为有效,如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就采用了这种笺注方法。这种方法特别注重考察诗句在用字、句法、修辞等方面在古代诗文中的最早用法。如仇氏注释杜甫《重经昭陵》中的“风尘三尺剑”一句即是:“古诗中用风尘有二义,如《前汉·终军传》‘边境时有风尘之警’,即杜诗‘风尘三尺剑’也。如陆机诗‘京洛多风尘’,即杜诗‘风尘为客日’也。一是战斗之风尘,一是行旅之风尘。《汉·高帝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sup>[4](P112)</sup>这种字注句疏的方法,真正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处,其好处是,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诗歌典故的出处,进而方便读者理解诗意。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也采用了这一方法,如注释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中的“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两

句诗:“‘护田’和‘排闥’都是从《汉书》里来,所谓‘史对史’,‘汉人语对汉人语’;整个句法从五代时沈彬的诗里来,所谓‘脱胎换骨’。可是不知道这些字眼和句法所脱骨的‘来历’,并不妨碍我们了解这两句的意义和欣赏描写的生动;我们只认为‘护田’和‘排闥’是两个比喻,并不觉得是古典。所以这是个比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读者不必依赖笺注的外来援助,也能领会,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sup>[3](P48)</sup>钱钟书先生一方面给读者指出了“护田”和“排闥”两个古典的出处,另一方面又分析了这两个用典的妙处。注《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两句诗时,他首先指出了“‘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家庐舍》之‘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之‘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之‘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在引用了这些前人用“绿”字的诗句后,钱钟书发问了:“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sup>[3](P49)</sup>从这一连串的发问中可以看出,作为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钱先生不是仅仅为了一骋自己的才学,而是为了帮助读者思考这些被后世所称道的诗句的创新性在哪里。宋诗中的很多用法,表面看来很有新意,殊不知前人诗歌中早已用之,如钱钟书先生注欧阳修《别滁》之“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两句诗云:“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正从这首诗来。欧阳修这两句可以说是唐人张谓《送卢举使河源》里‘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管为君愁’;武元衡《酬裴起居》:‘况是池塘风雨夜,不堪弦管尽离声’;白居易《及第后归觐》:‘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等等的翻案。”<sup>[3](P28)</sup>又如注刘攽《新晴》中的两句“惟有南风旧相识,偷闲门户又翻书”:“可以跟唐人薛能(一作曹邺)《老圃堂》的‘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比较。‘南风旧相识’大约来自李白《春思》的‘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因此,在诗歌笺注中使用推源溯流法,可以发现诗歌修辞技巧上的原创性。

宋代的很多诗人,尤其是江西诗派的诗人以杜甫为摹仿对象,杜诗中的很多词句、意象甚至被他们直接所借用,钱钟书先生在注释这些作品时,注意到



了这些作品与杜诗的渊源关系,如王庭珪《和周秀实田家行》之“便令壮士挽天河,不使腥羶汗后土”,钱钟书先生在注释中指出:“杜甫庆祝‘破敌收京’的《洗兵马》诗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是希望彼此不再打仗,王庭珪借用他的句子而一反他的用意,希望破敌的英雄乘胜直追,把外国人扫荡出去,恢复一片干净土。”<sup>[3](P124)</sup>又如曾几《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中的“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这一联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床头屋漏无干处’和‘春日江村’第一首的‘春流岸岸深’”<sup>[3](P127)</sup>。钱钟书先生不仅指出借用诗句的出处,还特别注重将这些前后诗人相似的诗歌作比较,以判断其高下得失。比较法也是《宋诗选注》中使用最频繁的方法,可以说贯穿于《宋诗选注》始终。钱钟书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比较文学大师,他在《宋诗选注》中特别注重对前后诗人的影响的比较研究,比如论晏殊时,指出他主要受李商隐的影响后,又认为“他跟当时师法李商隐的西昆体作者以及宋庠、宋祁、胡宿等人不同,比较活泼轻快,不像他们那样浓得化不开,窒塞闷气”,但也批评了“他也有时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而更是摹仿李商隐的流弊”。<sup>[3](P12)</sup>又如注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中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是古今传诵的诗,其实脱胎于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八《马上作》:‘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不过第三句写得比陆游的新警。……另一位‘江湖派’诗人张良臣的《雪窗小集》,里面的《偶题》说:‘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敲;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第三句有闲字填衬,也不及叶绍翁的来得具体。这种景色,唐人也曾描写,例如温庭筠《杏花》:‘杳杳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

门。’吴融《途见杏花》:‘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又《杏花》:‘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李建勋《梅花寄所亲》:‘云鬓自粘飘处粉,玉鞭谁指出墙枝’;但或则和其他的情景搀杂排列,或则没有安放在一篇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地位,都不及宋人写得这样醒豁。”<sup>[3](P266)</sup>这里列举了前代诗歌中的相同用法,但列举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在比较中强调宋人的创造性。

与《杜诗详注》只注重字句上的溯源流,注重琐碎的字句笺注不同的是,《宋诗选注》还特别注重对整体的写法、风格上的推源溯流,一方面考察宋代诗人与前代诗人风格上的联系,另一方面将前后诗句加以比较,从而分析出他们的高下得失。如钱先生在注吕本中的《兵乱后杂诗》时指出:“像‘报国宁无策,全躯各有词’这一联,把‘曲线救国’者的丑态写得惟妙惟肖。这些诗的风格显然学杜甫,‘报国’这一联也就从杜甫《有感》第五首的‘领郡辄无色,之官皆有词’脱胎,真可算‘点铁成金’了。”<sup>[3](P117)</sup>又如注陆游的《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云:“这一首纪梦的诗可以算跟岑参‘梦中神遇’,内容和风格都极像岑参的《白雪歌》《轮台歌》《天山雪歌》《走马川行》等等。”<sup>[3](P179)</sup>

综上所述,《宋诗选注》完整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尤其是《诗品》推源溯流的文学批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诗选注》是一部现代人写成的《宋诗品》。

#### 参考文献:

- [1]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3]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4]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